

编者按:方法与理论构成论文的两大核心要素,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进入数字化时代,旅游研究在方法层面的创新日新月异,但相较之下,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反思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围绕这一方法与理论的张力关系,杨旻教授分享了其观察与思考,强调应当警惕“方法崇拜”,指出学术研究的核心仍需回归学术问题本身及其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方法推动理论深化的3条路径,倡导旅游研究者走向一条“以理论为目标、方法为路径”的学术发展之路。

——苏晓波 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

方法创新是否会削弱理论思考?

——数字化浪潮下旅游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杨 旻

(天普大学体育、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美国 费城 19122)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革命不仅成为旅游行业创新升级的强大动力,也推动了旅游者行为、旅游需求预测等旅游领域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和深入。但旅游研究在享受上述“技术红利”的同时,与之匹配的理论突破和问题创新不多,甚至一些研究有陷入“方法崇拜”“数据主义”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数字技术价值的发挥。因此,重新审视数字化浪潮中旅游研究方法创新的实践和过程,或许能提醒研究者们走出单纯注重方法的研究误区,更多思考其中蕴含的理论问题,重视回归旅游研究问题导向这一核心逻辑。

一、方法革新的浪潮

回顾过去十几年,科技上的每一次进步也为旅游研究带来一次方法上的“升级”。以数据技术为例,早期仅有问卷、访谈、观测,以及旅游年鉴、游客抽样调查资料等官方统计数据可用,其时效性、拓展性和获取效率十分有限。近些年,涌现出的在线旅游平台预订记录、社交媒体评论、街景图像、移动信令、视频等新型数据源,不断帮助研究者突破样本量和时间延迟的限制,可以更微观、更实时地观察游客行为。比如在小尺度目的地内游客空间移动规律的研究上,传统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测、问卷调查或定性数据的解析,所能得到的游客行为的信息量少,准确性差,如今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则能刻画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空间计量模型、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虚拟仿真等工具也走进了旅

游学者的工具箱,使得旅游学者对旅游领域中复杂现象的测量和预测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变化带来了显著的“研究红利”,不仅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即时性、可靠性、准确性、普适性,还解决了以往无法触及的研究问题。

二、方法崇拜的隐忧

对“数据技术”的批评和反思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论文在数据和方法上花费大篇幅,却在理论贡献部分寥寥数语。读者往往看完后会觉得“技术很炫”,但随之会产生“那又怎样”的困惑。这一现象让人们产生一种人类社会、复杂世界中的各种内在联系等同于相关数据的计量关系,甚至“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①的错觉。此类“方法至上”的倾向,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方法的进步当然值得肯定,但如果研究者过度依赖,就可能导致研究失衡。这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方法创新的同时,是否有忽略理论思考的风险。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有关人、体验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现象。旅游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和解释其中蕴含的各种关系及其价值。若只是一味追逐新方法,而不去思考这些方法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其结果能够解释什么、挑战什么、推动什么,这种舍本逐末式的研究就会变得空心,难以触及所研究问题的本质。同时,这也会导致成果的碎片化。很多单一场景或短期的定量化实证虽易于

^① 高兆明.“数据主义”的人文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18(4):162-170.

开展,但其结论往往是点状和截面的,若缺乏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与整合,就很难形成可持续的研究积累,也无法对问题进行系统解释。最近,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凸显了这种矛盾。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兴起使得一些研究者在文献综述、数据分析甚至问题生成上,都能借助这些外力轻松实现^①。这大大降低了研究的“操作门槛”,甚至让一些学者陷入“方法幻觉”,认为研究无非是用人工智能跑一遍模型、算算数据、生成一堆结果。事实上,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它往往带着偏差,也可能产生“幻觉”,缺乏情境和伦理判断^②。若对此缺乏足够警觉,旅游研究就会被方法所裹挟,偏离预设的学术目标,失去价值导向。

更值得警惕的是,方法崇拜还会导致“炫技式”的写作。文章在方法部分层层叠叠,晦涩难懂,但在理论阐释上却语焉不详。长此以往,学科可能失去累积理论的动力。不少同行担心如果过于关注方法和技术,而忽略理论发展和核心问题凝练,旅游话题就会成为其他技术的应用场景和附庸,旅游学科也会被划入“技术应用学”,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旅游一直以来面临的学科认同和身份危机也就更加难以解决了。

三、方法推动理论深化的路径

上述担忧并不意味着方法创新的方向有误,而是在提醒人们重视技术突破的同时,应兼顾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和成果的可延展性,使技术进步能够更好地服务旅游学科的发展。根据笔者自身的科研经验,方法和数据已不仅是旅游理论发展的“催化剂”,正不断为剖析已有理论提供新的“透镜”,并成为重塑理论的推动力。要避免陷入“方法炫技”,关键在于理解技术如何成为理论深化的驱动器。其实现路径至少包括以下3个方面,每一条路径都对应一组可在旅游研究中反复应用的核心思想和技术逻辑。

第一,解锁隐含关系,以可测量性推动理论精确化。在旅游研究中,空间引力模型长期作为解释旅游流动的核心框架,但其在微观层面的行为机制过去无法被验证。笔者在近期研究中利用高频率高精度的手机定位数据,得以观察数百万真实出行链条的完整结构,包括多目的地停留、路径选择与出行节奏。这类高分辨率的行为轨迹,使研究者首次能够检验“引力机制在微观层面是否成立,在哪些场景出现系统性偏离,偏离的根源是什么”。基

于这些证据,能够识别出传统引力模型在多目的地旅行中的误差来源,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方向。这种由实证轨迹支持的“误差-修正-再推导”过程,让引力模型从宏观假设走向细粒度的机制识别,也展示了新型数据在推动理论精确化方面的独特价值。总而言之,技术真正推动理论的方式,是让理论假设中的关键变量变得可观测、可度量、可检验。理论不是因数据而被替代,而是因数据而被强化。

第二,通过跨尺度、跨模态整合,打通学科界限和理论边界,实现理论的整合。当前,多模态数据(轨迹、图像、文本、生理反应等)实现了行为、情绪和环境等多种属性的共生。理论间的隔阂随之被弱化,学科间的壁垒也被打通。这种整合能力使旅游研究拥有了生成“复合理论”的条件。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分析街景图像,并将游客发布的带有地理标记的照片、评论文本中的情绪与该地的街景环境特征进行动态匹配,进而检验城市街道形态与游客情绪的关系。结果不仅验证了环境心理学中的“物理环境影响情绪体验”,也激活了情感地理学有关“情绪-空间关系”的核心论题,同时进一步扩展了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解释力。因此,新方法的价值在于为理论的跨学科整合提供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尺度”,从而推动理论从单维到多维,从分散到整体。

第三,新技术引发新实践、新思考,推动理论从再解释走向再生成。技术不仅帮助回答旧问题,还会创造新现象,从而迫使理论转向新的方向。数字化研究范式正在重塑人们对“游客”和“体验”等传统概念的理解。在算法化环境中,游客逐渐被视为可被预测的行为主体,其选择逻辑受推荐系统、平台规则与算法偏差的显著影响。旅游体验也从主观感受转化为模型可读取的表达。这些变化为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游客的自主性是否正在被技术重塑?体验的原真性如何在数字环境中被定义?技术介入后的旅游行为是否仍能用传统理论解释?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理论的延伸,而是理论的再生产。与此同时,数据隐私、算法公平性、人机协同认知等议题也赋予旅游研究新的伦理维度与社

① LI J, XU L, TANG L, et al. Big data in tourism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8: 301-323.

② BURGER B, KANBACH D K, KRAUS S, et al. On the use of AI-based tools like ChatGPT to support management research[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3, 26(7): 233-241.

会意义。当技术改变了旅游现象的生成方式,理论也必须随之更新。新技术不是附属变量,而是旅游系统中的新“行动者”,是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推力来源。

上述 3 方面说明,技术创新从来不是理论的终点,而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当前,旅游领域正逐渐形成以“方法创新”和“理论思考”双轮驱动的研究模式。旅游研究不应将二者视为彼此竞争的两极,而是协同演进、良性互动,互为动力源。方法的真正价值,在于让理论可检验、可融合、可再生。未来的旅游研究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算法,而是更多能够通过算法真正推动理论发展的研究思维。以此为基础,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真正把握理论突破的方向。

四、未来展望

如果说过去 10 年,“数据”与“方法”塑造了旅游研究的主旋律,那么未来更值得期待的是,理论在数字化语境中的成熟与突破。数字化浪潮已经改

变了旅游研究者的工具箱和思维习惯,让研究更高效、更精准,也让一些受限于数据而处于“黑箱”状态旅游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更为关键的是,方法的价值从来不是单面的,新数据和新方法也为拓展旅游研究的理论边界、深化对复杂旅游现象的认知提供了条件。然而,新方法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新理论,理论的成长依赖研究者持续保持问题意识,善用数据技术去检验、丰富与重构理论结构。

未来的旅游研究需要“以理论为目标、方法为路径”。方法创新应服务于理论深化,而理论的发展也将反过来引导方法的选择、数据的结构化方式以及研究设计的逻辑。在这一意义上,理论与方法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两股力量。只有当研究者既敢于拥抱新技术,又能守住理论的根基,才能使旅游学科在数字化时代获得真正的累积性知识,并在学科内部建立更强的理论自信。

[责任编辑:吴巧红; 责任校对:宋志伟]